

深刻的反思 改革的龟鉴

——读《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

陈 兵

佛教入华近二千年间,前一千九百年,虽然路途漫长,但都是跋涉于超稳定的封建社会,步履较为平稳,节奏相当缓慢。近百年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促使衰老的佛教紧迫时代步伐快步向前,短短时间内,所历崎岖坎坷,所起兴衰变化,实逾以往千年,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亦不少于卷帙浩瀚的大藏经。温故而知新,对这段重要历程回顾反思、深入研究总结,不仅可为当代佛教的振兴提供经验教训,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对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然学术界、佛教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却最显薄弱,近几年来才受到重视,有了几本专著问世,其中最为精彩、最值得一读的,是中年学者邓子美先生最近出版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这本书的突出特色,略有以下三点。

一、高屋建瓴,气势宏大。

此书虽以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史为内容,却不限于历史事件的顺序罗列,而是一本以传统佛教近代化为主题的史论。作者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全局着眼,从百年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上,对佛教这一近代各种文化的交汇点,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多角度的审视。全书贯串着一条文化与社会近代化相促进相制约的主线,阐明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急剧衰落,在社会巨变和思想“饥荒”中,佛教得以乘机复兴,它兼宗教与学术两任于一身,在维新与革命相继演进的时代主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佛教自身产生了诸多蜕变、自我改造与内部分化,经历了顺流而下(约1830—1919)、新潮勃兴(1919—

1931)、回旋往复(1931—1947)三大阶段,对其间凡五代佛教思想家们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作者以史学家的清澈眼光作了审察,梳理得清清楚楚。作者观察佛教的视角颇为宽广,尤其重在从宗教比较学的角度,以西方基督教近代化的进程,与中国佛教的近代化处处作比较,阐明中国佛教近代化的必然性及其成败的原因,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成就、规模、社会作用,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全书气势宏大,思路清晰,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二、资料丰富,取精用宏。

此书虽以论述中国佛教近代化为主题,内容实涉及近代中国佛教的全部历程及其方方面面。从龚自珍、魏源之由儒入佛,维新诸君子之鼓吹佛教,到佛教复兴主将太虚大师之辞世;从中华佛教总会之组建、两次庙产兴学风潮及佛教教育之勃兴,到刻经办刊等佛教文化事业之发达;从谛闲、月霞、虚云、印光、弘一之重兴台、贤、禅、净、律诸宗,到梵巴印藏、中外佛教交流、密教重兴,科学与佛学融通,学界佛学研究之风气;从佛教慈善救济活动,到佛教文艺之发达、国际佛教交流之频繁、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佛教人士之参与抗战等,无不涉及,可谓面面俱到。全书仅25万字,很少像一般史书那样大段引证史料,然其覆盖面之宽,所涉及人物、事件之多,超过同类诸书。如它书很少提及的古文经学家俞樾闭门校点《金刚经》,恭亲王奕訢参禅,顾净缘推动湖南佛教,袁焕仙、贾题韬等创建维摩精舍弘扬居士禅,赵朴初于上海抗战中统筹收容难民50余万人等,亦皆言及。随思路所到,笔触还往往超越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或远追于古代,或横涉全亚洲佛教复兴运动,或征引西方近现代宗教比较学、宗教社

书林漫步

• 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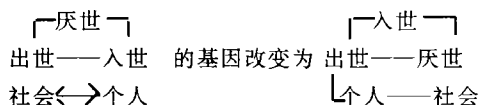
会学等新学科的观点。可谓苞罗宏富，取精用宏。

三、精深独到，卓见迭出。

此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作者对中国近代佛教历程作科学分析、深刻反思，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诸如：

关于近代佛教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作者据大量史实总结：主要原因在于佛教自身的“头重脚轻”——头，指“丰富庞杂的中国大乘佛教教义体系及其可塑性，成为近代佛教改革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脚，指传统农业社会所造就的大量下层信众的宗教需求远远落后于时代，使固守佛教传统的僧侣不想变也不必求变，全国县以下的佛教会，大多由宗法势力把持，头脚互相脱节，导致佛教改革障碍重重。

关于佛教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可谓全书的中心论点。作者通过对文化发展趋势的分析论证：传统佛教必须、必然适应近代社会而变革自身，实现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若只是墨守传统，至多只能使佛教仅仅生存于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厌世群体之中，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教化功能，难于在种种挑战中保全自身。“固守传统佛教的传播模式，路子只能越走越窄”。据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延续发展的生命力的强弱，“归根到底要视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文化传播手段而定。”中国佛教教义中，存在着实现近代化的潜能。用结构学派惯用的模式来表达，只须把传统佛教基因重排列，把历来



佛教教义便可适应近代社会，并起到促进社会近代化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须借助近代理性的工具，对传统佛教各派的共同教义及其不同修持方式进行研究，采纳其中有利于佛教与社会近代化的基因，进行整合。应以原始佛教的理性为基线，揉入法相宗严密的条理、华严宏大的精神，贯通台、禅、

净诸宗。应进一步发扬转换佛教本含的理性精神，扩散于整个体系，形成新的有机联结。

作者认为：如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可转化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天职”观念一样，佛教的戒定慧等修学模式，也可转化。严持禁戒的禁欲主义只要再上升一步，“把提倡节欲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用于慈善、教育、文化事业的投资；通过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唐代禅宗百丈家风，还可以与生产、旅游服务、贸易经营相联系；进而把‘一切资生事业’与佛教终极关怀——成佛联结起来，就完全可以起到与新教‘天职’观念类似的作用。”至于传统的苦行与僧范，可以转为近代的人格自律，高僧的人格感染是佛教伦理影响大众文化的主要渠道。

关于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改革失败的原因。作者在与基督教改革作比较研究后指出：与西方早已存在多元共生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封建帝制虽然崩溃了，但作为佛教改革主要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中国古代以家庭农业经济、伦理政治、伦理中心文化为本的单元共轭结构并未根本改变，缺乏有利于佛教近代化的政治法律环境。佛教的近代化，有待于物质生活的提高，有待于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法律设施在社会中普遍生根，从而给失范状态下的民众提供新的机遇。“只有信徒在现世的劳作能够获得宗教期许的证验，他们才能对近代的心理、伦理、教育等社会需求热心起来，传统宗教才可能实现近代化。”

另外，近代佛教内部也存在着妨碍其改革成功的弊病：“如佛学研究大多未能有效地为佛教改革提供指导，佛教革新运动一度颇有声势而未注重实效，佛教界忙于内部纷争而缺乏竞争，新佛教对安慰少数社会游离分子有余而对多数人需要的心理调节手段开发不足，对禁欲主义宣扬有余而对有助于培养自主人格的教育资源开发不足等。这些都限制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发挥。”

这些卓见，对当今佛教的振兴改革，提供了颇为宝贵的龟鉴，值得佛教界人士和关心佛教的人们深思，对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亦不无启示。